

“祛魅”与“赋魅”： 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消解与重塑

沈萍霞, 李林活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教师权威是师德、师智、师技的精神镜像,能够产生使人自愿遵从且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精神力量。高尚的德行使教师赢得无限的敬仰与威望,其影响力由此跃升至精神引领层面,催生出知识权威、制度权威与感召权威。然而,进入数智时代,技术能级的跃迁与学习要素的聚变冲击着传统教育范式,教师权威遭遇“祛魅”危机,具体表现为知识权威褪色、制度权威式微与感召权威旁落。运用“技术-组织-环境”框架分析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祛魅”的缘由,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技术平权导致教师知识话语权衰弱、场域组织结构颠覆引发教师传统地位动摇、虚拟交互机制加剧师生情感疏离。因此,需以技术、组织和环境为切入点,开辟多点聚合、法理共治、内外共长的教师权威“赋魅”新路径:观照技术具身,重塑教师专业权威;健全数智法治,重振教师制度权威;涵养互育文化,彰显教师魅力权威。通过上述路径,实现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转型,进而修复教师角色的本源意义。

关键词:数智时代;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权威;教师角色;“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权威消解;危机表征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6)03-0082-09

基金项目:2025年度陕西省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发展研究项目“教育家精神驱动教师成长的多元体制机制协同研究”(SJS2025ZD006)。

作者简介:沈萍霞,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林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权威表征着人类特有的内在精神潜能,是个体能量向外释放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源泉。教师权威则是教师所拥有的使人敬畏、信服及遵从的思想力量,具有极强的统摄力、支配力和影响力。我国尊师重道的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持续强调教师地位的不可替代性,相继出台《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重要文件,不断为教师注入精神动

力,持续巩固教师权威这一在专业领域具有象征意义的声望资源。然而,随着科学技术跃迁和教育范式变革,教师权威正遭受强烈冲击。如何摆脱教师权威不断弱化的困境,探索数字生态圈下教师生存的新路径,是新时代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将权威分为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合法权威。克利夫顿(Clifton)和罗伯兹(Roberts)在此基础上将教师权威分为法定权威、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专业权威^[1]。有研究进一步将教师传统权威和

法定权威作为外部的制度权威加以论述^[2]。综合学界观点,教师权威可以分为教师知识权威、教师制度权威和教师感召权威三类。具体而言,教师知识权威指教师凭借卓越学识、技术专长等专业品质所获得的仰慕、信赖与尊重;教师制度权威指社会组织与国家所赋予教师的传统特殊权力;教师感召权威指教师的品格、精神、魅力等抽象人格力量对学生产生的价值引领。1990年,托纳茨基(Tornatzky)和弗莱舍(Fleischer)创建了“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理论框架^[3]。该理论框架因其良好的适应性和拓展性,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学、生态学、管理学等领域。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应用所涉及的技术要素匹配、组织资源同构和数字环境导引等交互机制,与TOE理论框架的三大维度组合视角不谋而合,教师的知识权威、制度权威和感召权威分别对应数智生态圈的三类特质。因此,数智时代的教师权威可以说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形成了技术—知识驱动型、组织—制度驱动型、环境—感召驱动型三条权威组合路径,兼具复合的因果机制和对多因素间复杂本质的理性认知。可见,用TOE理论框架来分析数智场域中的教师权威问题,可以有效弥补单要素、单视角论述的局限,是探明人工智能变局下教师权威梗阻及其纾解之道的有效路径。

一、数智时代教师权威面临的新问题——“祛魅”

在多元要素相互角力的数智背景下,透视教师权威的现实样态,可以发现其存在数字技术夹击下知识权威褪色、教学组织变革下制度权威式微、智能环境重构下感召权威旁落的新问题。

(一)知识权威褪色:教师知识“代言人”地位失守

知识资本是教师权威的内在源泉。在传统教学场域中,教师作为知识“领导者”的地位毋庸置疑,其知识权威具有长效性、强势性与

深刻性。然而,进入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出现动摇了教师的知识“主导地位”,教师作为知识引领者的传统角色亟待重新定位,其在知识生态中的价值也需被重新审视。

一是教师的知识生产与存储功能被削弱,教师知识权威逐渐淡化。计算机凭借快速、准确、低失误的运行特点,展现出无可比拟的通用性、精确性与增值性等优势,使人类不自觉地屈从于数字技术逻辑。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深化,教师的知识生产与存储能力在各类强大的技术工具面前不再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人类大脑在机能和容量上的局限,使教师难以长久保持饱满的教学状态与人格感染力。教师在知识“再创造”中的自信心日渐式微,逐渐丧失知识“代言人”的地位。学生利用泛在化的数字学习环境,能够积累起逼近教师知识储备阈值的知识量。认知赋权的民主化进程,正在解构教育生态中传统的知识权力差序格局。相关研究表明,在线学习模式的兴起使学生逐渐发现,借助资源丰富的网络,即使不依赖于教师,也可以完成知识的挖掘与习得^[4]。因此,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教师知识权威被计算机系统的信息整合能力压制,教师知识话语权在部分学生认知图谱中逐渐弱化。

二是知识传授和应用功能的异化,动摇了教师的传统权威。数智时代所推崇的高效率、精准化、数据化,对教育生态产生了辐射效应。在知识传授层面,学生对教师权威的内在认同容易转变为对成绩提升的极端功利追求,学生仅将教师视为实现学业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教师所承载的价值理性与人文精神。在知识应用层面,虚拟现实与智能算法能够为学生提供沉浸式、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相比之下,教师传统教学方式显得略为笼统和滞后。例如,拔尖学生渴求的高阶知识探索与后进生需要的差异化辅导,在固化、单一的教学框架中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这种结构性矛盾迫使学生转向技术辅助,以获取更具适配性的学习支持。知识学习由此从“孔子曰”时代跨越到了

“人工智能认为”的时代^[5]。知识作为信息产品在网络上日益成为一种易得产品^[6]。进言之,若教育实践缺乏价值理性的观照,知识便可能逐渐被简化为工具性符号,教师因知识优势而形成的传统权威亟待重构。

(二)制度权威式微:教师传统地位面临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即正当性、正统性和有效性^[7]。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教师天然享有崇高权威,现代法律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然而,进入数智时代,理念革新不断激发公众对民主与平等的渴望,技术的介入冲击着学校教育场域的既有框架,导致教师传统地位面临合法性危机,其制度权威日益弱化。

第一,“以人为师”的传统遭到挑战,教师权威逐渐隐匿。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使得“机器执教”成为现实。AI以“专业教育”的姿态进入学校空间,学校在教育传统格局中的主体地位面临挑战。有研究表明,学生对AI全科教师主讲课程的满意度总体较高,大部分学生高度认可并接纳此类课程^[8]。可见,学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人师”价值导向,这撼动了社会长期以来认可的“人本教育”理念的根基,颠覆了“以人为师”开展教育活动、实现教育价值的普遍认知。互联网与大数据创造出数不胜数的AI教师,人类教师的专业素质与AI相比在某些方面显现出不足。教师主体性遭到压制,创造力愈发不足。有研究指出,AI技术应用会给教师带来负担、挑战和压力,引发关于专业自主的深层焦虑^[9]。由此可见,数智时代,教师作为“人”的主体性正面临萎缩,人类作为教师的唯一主体地位被不断蚕食,“以人为师”的传统受到正当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质疑,教师的制度权威因其主体地位弱化而被削弱。

第二,在“人人皆可为师”语境下,教师权威趋向分散。在传统教育体系中,教师专业身份的合法性根植于标准的资格认证与教学评估程序,教师的制度权威正是通过这一准入机制得以强化。然而,数智时代的到来正在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固有模式。移动互联网技术凭

借知识共享的低时空成本,使个体得以跨越层级化筛选机制,平等分享知识,并自发汇集形成具备创新视角的专业化群体,形成以需求或兴趣为导向的“在线社群”。借助无所不在的网络平台,教育者的身份生成逻辑正在经历从传统制度性授权,转向依托学习内容价值密度与学习群体自发认同的新范式。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即互联网上的“虚拟教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原有教育体制对教师角色的界定与权威设定,使教育传授方式更加去中心化。随着虚拟教育者数量的规模化扩张,教师角色的排他性逐渐被解构,教育体系转型为“节点共生”模式,教师称谓日益泛化。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准入制度所承载的符号化权威正面临着被稀释的风险,原本象征教师限定属性的制度权威已显露出衰弱之势。

(三)感召权威旁落:教师遭遇角色窄化与身份困顿

教师感召权威源自其作为文化资本所承载的人格魅力与道德素养,是教师基于自身的德、勤、能赢得的内在精神召唤,本质上是一种无形的榜样力量。这种道德典范与人格感染力能够推动学生向善向美发展。然而,在数智时代,智能技术的教育具身化导致教师的感召权威遭遇旁落危机。

一方面,教学角色窄化,教师权威模糊。在智能教育环境中,机器人和算法能够高效完成知识传输、学习进度跟踪和个性化辅导等教学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角色的功能价值。随着算法驱动的教学工具与自动化学学习系统的应用,教师被视为单纯的技术辅助者而非技术协助下的教学主导者,其角色从以往知识信息权威供给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和赋能者。统计数据显示,采用AI助教主讲课例的真人教师,备课时间与上课时间分别减少了52.8%与80.1%^[10]。教师从教学话语的构建主体变成技术脚本的执行客体。这一角色变迁,无形中缩减了教师作为信息源泉与教学主导者的角色范畴,也间接使学生心目中教

师形象被简化与边缘化。当 AI 承担了主要任务时,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容易被外包^[11],教师角色趋向工具化和辅助化,其作为无可替代的权威形象日渐淡化。伴随着这一转变,学生与教师基于深层次互动所产生的情感联结逐渐松动,教师作为“灵魂工程师”的经典形象遭遇时代变迁带来的重塑压力,其内在的感召力与权威性正面临被稀释的风险。

另一方面,当前舆论中存在师德形象被过度矮化和污名化的倾向,教师权威逐渐被消解。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教师职业道德形象。个别教师的职业失范行为经由网络平台的放大镜效应,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极易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负面舆情风暴。有研究指出,在当今大众媒体中,教师形象的负面报道日益增多,甚至有被妖魔化的趋势^[12],有些媒体也有意无意将教师描述成训诫者、敛财者、体罚者等形象^[13]。这一系列负面标签,都对教师的神圣性形成了“祛魅”效应。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的学生群体,极易受到此类报道影响,对周围教师形成先入为主的负面认知。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容易扭曲学生对教师形象的正面理解,还可能削弱其内心深处对教师应有的崇敬之情,从根本上消解了教师作为学生成长道路上“重要他人”的示范价值,继而动摇师德榜样的正当性,削弱学生对教师职业正当性和崇高性的认同,降低其对教师的人格信任与情感期待,教师的感召权威由此陷入消解危机。

二、TOE 理论框架下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祛魅”新缘由

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推动教育行业迈入数字赋能、数字驱动的新阶段,为教师搭建起资源获取更加便捷、聚合效果更加显著的教学“脚手架”。由于对技术、组织、环境的掌控尚不成熟,人工智能的独特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与有效释放,存在着技术霸权、组织颠覆、环境阻隔等问题。教师权威遭遇“祛魅”挑战。

(一)技术维度:知识平权下技术霸权的兴起 数字技术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打破

了知识传播的垄断格局。技术的精准性、高效性使计算机跃升为新兴的知识权威象征。学生和教师都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网络平权空间,双方均被迫融入技术主导的话语体系,教师逐渐远离原有的专业主导地位,陷入知识诠释的边缘化困境。

第一,从“技术辅助”到“技术主体”,教师教学的主体性使命渐行渐远。现代技术的诞生带来了技术力量的倒置,技术从解放人类的力量变成一种治理的手段^[14]。在“技术辅助”阶段,教师依然占据主要地位,技术工具如电子白板、在线学习平台等被视作教师教学的补充手段,旨在增强教学效果而非取代教师。而在“技术主体”阶段,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供即时反馈,还能根据学生学习进度智能化地调整教学策略、模拟专业教学样态,这无疑削弱了教师的知识解读权与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师的角色功能。此外,年轻一代更倾向于接受技术所提供的便捷服务,当技术能够独立完成知识传授与辅导时,教师权威必然会面临衰落的危机。技术主体化还会带来教育内容和价值取向方面的挑战。基于文化强势语言训练的智能生成内容,本身就会对人类知识、文化和语言造成危害^[15]。加之目前信息筛选机制尚不成熟,技术一旦成为教育主导者,其所传递的信息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如果技术主体过于强调效率和功利,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性思维培养则可能被边缘化,人为的“秩序”构建可能难以实现对“主体化的数字人”风险的规制^[16],由教师权威带来的教育规制效果也将随之弱化。

第二,从“文化进化”到“技术进化”,教师育人的专业性价值容易遭受裹挟。生物进化相对缓慢,因此人类转向文化进化,以实现加速发展^[17]。然而,数字技术凭借其指数级增长速度,僭越了人类文化进化的规则,使人类催生出对技术进化的无尽追求。技术进化的盛行以及数字化生存所导致的“全景遮蔽”现象,正在暗中背离教育的本质。若迷失了教育理想与精神,教师则可能跌入由数字化生存所布下的陷阱^[18]。在数智社会的疾风骤雨中,技术

进化论将“及时反馈”奉为现代教育的圭臬，“慢”则被贴上反进步的标签，象征着落伍与淘汰的命运。教育本身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教师本应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角色，教学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然而，在效率至上、速成主义信条的支配下，人们倾向于追求技术支持下的功利性、快捷性的教育回报，技术进化论也使学生更加关注教师所授知识在短时间内带来的效益。当教师技能更新速度赶不上迅猛的技术更迭时，教师在学生心中教书育人的分量会逐渐下降，学生对教师知识传授的重视程度亦随之递减，教师育人的专业性价值悄然隐退，教师权威日渐式微。

（二）组织维度：教育革新下传统范式的颠覆

数字化转型标志着组织的系统性重塑，它不仅是技术驱动下的渐进式流程改进，更是对整个系统内外部要素的根本性重构，并以此形成新的教育生态系统^[19]。随着组织变革的发生，价值导向也自然发生改变，并引发教育理念和权力结构的变革，致使教师权威开始动摇。

第一，组织结构去中心化，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被弱化。传统教育范式是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传授模式，师生关系更倾向于上下级关系，教师严格掌控课堂并拥有绝对话语权。然而，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教育范式正逐步构建更加开放、互动与个性化的学习生态。新型社会化学习和人机协作式学习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新型教育组织结构，即去中心化。它降低了层级制对个体的约束力，教育场域因此趋向于扁平化管理和团队化协作。研究表明，在线学习模式容易使学生的学习态度变得更加随意，学生易在上课期间利用聊天软件与同学自发建群交流^[4]。同时，网络虚拟教育空间改变了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传统的单向度知识灌输被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与合作所取代，教师的“一言堂”模式逐渐淡出，教育模式转向强调网络空间的平等对话而非严格的制度约束。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等观念进一步消解了教师在传统地位上的绝对权威，教师支撑结构面临被解构的风险，这削弱了传统等级观念所确立的教师制度权威。

第二，教师社群多元化，师道传统由表及里地消散。数智时代，教育生态由封闭、集中的知识传递模式向开放、分散的终身学习网络转型。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催生出各类教师社群学习样态，如教师博客社群、教师论坛社群、教师主题网站社群等。作为教师知识分享、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教师社群学习环境基于现有网络通信技术，能够弥补传统教师研习在时空方面的局限，本质上是对传统教师学习形式的有益补充。然而，教师社群的多元化在数智时代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教育者队伍日趋多元，涵盖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在线课程开发者乃至 AI 教育辅助系统等多种角色，甚至出现了 AI 代理、AI 助手、AI 伙伴等新型 AI 教师模式^[20]。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无疑会削弱教师在传统教育框架内的权威中心地位，迫使教师角色发生转型。在此背景下，教师的传统权威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更加平等的协作与共创的教育生态。教育理念和教育范式受到冲击，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这既象征着教育的进步与突破，也意味着教师传统权威需要进化与迭代。

（三）环境维度：虚拟交互中情感疏离的隔阂

师生情感纽带的建立离不开实体环境的依托，但在数智时代，教育空间与智能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逐渐模糊。教育的人文价值不断被忽视，教师精神的完满性以及构建美好生活的神圣感无法有效传达，教师的感召权威随之削弱。

第一，虚拟匿名空间滋生师生情感疏离。在数智时代的教育图景中，虚拟交互平台因其匿名特点，构建出一种全新的沟通模式。这一模式虽赋予参与者表达的自由，但同时也引发了情感上的疏离。有学者通过结构性访谈发现，社会交往的异化、实践意义的隐没，均源于虚拟转换所带来的自我割裂以及时间秩序的伴随性消解^[21]。在匿名环境下，教师从过去的“连续”“在场”变为“非连续”“不在场”^[22]，师生之间基于面对面交流所建立的信任与亲密感趋于淡化。直接的感官刺激与即时的情感反馈缺失，导致主体间的共情能力下降，进而削弱了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与道德引领者的感

召力。因此,尽管虚拟空间中的学习体验丰富多元,但是无法完全复制真实课堂中直接而深刻的人际联结,教师的权威形象在虚拟社区中逐渐模糊。同时,数字化生存境遇下面临的转型危机,实质上是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失序。这种环境容易使人们以不加约束的方式进行感受、思考与行动,师生双方在沟通时表现出更强的直言不讳,教育场域缺乏传统礼仪的约束,这无疑会加剧师生之间的情感隔阂。

第二,虚拟互动机制导致师生交往失范。在虚拟空间中,身份建构机制使主体能够通过数字化实现超现实的自我呈现,学生由此可以在无物理束缚的环境下随时获取资源,并与其他人建立社交联结。然而,这种联结较之现实世界的互动往往更加脆弱。一方面,随着虚拟与现实界限的模糊,用户容易混淆“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当学生过度依赖虚拟教师代理时,他们会对其产生情感投射与依赖,从而导致现实中的情感代偿性退化。技术对个体的无形规训与控制,使教师个人魅力与经验判断在数字教育体系中的权重下降,学生较难体会到教师教书育人的精神感召与权威魅力。另一方面,以往面对面的交往方式逐渐被以信息符号为中介的虚拟交往方式所取代,主体间互动的真实感和信任感骤降,不可避免地出现信任危机,甚至衍生出数字空间中的侮辱、诽谤等负面现象,对教师个人魅力构成威胁。虚拟空间的匿名性降低了行为人对失德行为的罪恶感,在冲突情境下极易引发强烈的攻击倾向。在此情形下,师生交互中的失范行为极有可能持续加剧。

三、TOE 理论框架下数智时代教师权威“赋魅”新路径

杜威曾言:“当我们抛弃了外在的权威时,并不意味着继而抛弃一切权威,而是需要寻找一个更有效的权威源泉。”^[23]数智时代,教师权威虽面临“祛魅”困境,但并非意味着其被彻底抛弃。若能反客为主,借技术之手打造与时俱进、符合数智时代人学关系的新型教师权威,便能为教师形象重新“赋魅”,实现人性与崇高性的再次统一。

(一)观照技术具身,重塑教师专业权威

技术作为事物的呈现手段,依托于教师的身体知觉而存在,其效能的发挥亦依赖于教师技术具身的程度。在数智时代,教师技术具身不仅是教学革新的关键,更是教师专业权威重塑的重要路径。

首先,解码技术情境,使教师身体意向与技术意向相契合。数智时代教师与技术容易产生疏离,其原因在于教师排斥数字技术而产生技术规避的倾向,教师技术疏离常以认知保守、心理抵触、技能僵化为表征^[24]。价值观决定方法论。实践的导向与个体思维紧密相关。如果教师无法在身体和心理上真正接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教育变革,那么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教学技能的提升也只是纸上谈兵,教师专业权威的塑造更加缺乏说服力。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教师专业参与素养整体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参照欧盟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其中的“专业合作”和“反思实践”素养水平得分较低^[25],这说明教师未能从身心上接受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事实。因此,实现教师技术意向与身体意向的契合,首要举措在于双管齐下:既需着眼于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掌握数字化教学工具、增强数字化教学能力,也需激发教师内心深处对数字化转型的认可、理解与拥抱。前者旨在构建教师驾驭数字技术的硬实力,后者则聚焦于塑造其接纳变革的软实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师唯有将数字意识内化为自身教学实践的一部分,方能内外兼修,充分发挥其教育潜能,实现教学模式的革新与教学质量的跃升,进而重塑自身的教师专业权威。

其次,丰富技术资源,推动教师能力结构“换血”。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挑战,只有通过教师主体与技术主体的不断交互与建构,形成新型复合体,才能守住教师的主体性地位^[26]。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面对数智化浪潮引发的教育生态变革,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纯粹的技术迭代冲击,而应体认到教师知识与能力正面临结构性位移。这本质上是教育主体对技术意向性挑战的必然回应,也是呼唤教师能力结构实现全面“换血”的内在动因。技术意向性表明,教师只有构建以技术具身化为

导向的新型能力架构,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参照《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27]和《欧盟教育工作者数字胜任力框架》^[28],数智时代教师能力的重构应聚焦于四大核心维度:一是深度的技术整合与创新能力,即教师不仅要掌握技术工具的操作,更要培养将数字技术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的创新能力,以科技赋能教育,推动学习效率与质量的同步提升;二是人机协同教学能力,即在人工智能辅助下设计个性化学习路径,实现教学的人性化与智能化的平衡;三是自我持续成长与学习的能力,即教师需确保紧跟知识更新的步伐,不断吸纳新知,以适应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四是数字道德与情感智能,即培养教师在数字空间中引导学生形成良好价值观并有效理解学生情绪需求的能力,以构建全面支持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

(二)健全数智法治,重振教师制度权威

教师权威是以法为原则并践行法的行动规则的权威,也是一种确保教育共同体得以顺利运行的制衡力量^[29]。法律和规则的运行是教师传统权威得以稳固的基石。因此,在数智时代,巩固和深化法治内涵,通过实质性的约束确保教育行动遵循法律的指引,是恢复教师合法权威的关键所在。

首先,构建数智教育的法治保障体系。数智时代教育法治的完善,是重塑教师专业权威的基础。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教育伦理规范,能够确保技术服务于教育本质,避免工具理性取代人本教育的核心价值。该框架应涵盖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以及人机协作中教师角色的伦理定位,为教师在智能环境中的职责提供清晰的指导原则,从而增强其职业的合法权威。具体而言:一是要制定针对性法律法规,明确教师在混合教学环境中的权利与义务,保障教师在智能教育产品设计与使用中的参与权与监督权;二是要建立教育数据治理规则,确保学生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明确数据搜集、处理与使用的边界,同时教师作为数据处理的重要参与者,在保护学生隐私方面的责任与权利需得到法律明确;三是要设立数字教育伦理委员会,

为教育数字化进程中的伦理难题提供咨询与裁决,确保技术发展与应用始终遵循教育的人文精神与伦理原则。

其次,推动多元主体行为的法理重构。一方面,弘扬公民数字价值观与数字道德。数字价值观的培育与数字道德的塑造,是提升学生数字素养的核心抓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发布的《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界定了学生人工智能能力的四大基本要素,文中指出,人工智能伦理涵盖具身伦理、安全与负责任的使用、设计伦理等维度,强调学生应以符合伦理的方式设计、评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审慎审查人工智能法规^[30]。据此,应坚决抵制违背伦理与法律的人工智能行为,帮助学生提升数字能力,增强道德判断力与科学决策力,以应对人工智能产出的虚假信息或歧视性内容。另一方面,深化校家社数字化伦理教育的协同共育。数字法治与伦理教育是学校的职责,但也需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承担。因此,应将立德树人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目标,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大力提升用户共同体的数字素养,推动构建多方共同遵守的约束与规范机制,打造协同合作的数字化伦理教育生态。通过法律途径,确立涵盖诚实守信、安全性、包容性、审慎性以及辨别是非能力在内的核心数字价值观体系。这种全方位的伦理教育普及,不仅有助于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更能巩固教师的合法权威,维护其在教育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三)涵养互育文化,彰显教师魅力权威

教师权威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师生互动中实现的^[31]。教师魅力权威体现在其独特的人格特质、创新能力与情感联结上。数智时代海量的学习资源赋予学生反哺课堂的能力^[32]。教师只有基于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在平等交往、双向互动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相互哺育、互相滋养,才能顺利提振其魅力权威。

首先,唤醒互育主体意识,教师以“才”立威。有关AI教育机器人教学案例的研究发现,教师的价值在于聚焦有生命特征的工作,如开展价值引领、情感引导等教研活动^[33]。相较于AI的程序化反应与同质化交流,人类教

师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独特的人文价值触动学生的心智发展,塑造更为包容与激励的教育生态,提升学生的学习成就感与幸福感。在互育文化的浸润下,教师不再居于课堂高位、凌驾于学生之上,而是以平等、欣赏的眼光看待每名学生的智慧,赋予学生反哺课堂的主动权。教师在此过程中需要展现的能力,不仅在于维持基本的教学运转,更在于精准评估学生反馈的质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以及凸显教师尊重学生主体性的人文情怀。这种介入策略能够优化教学效果,深刻影响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彰显教师作为课堂引领者卓越的调控艺术——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复刻的。教师若能遵循人类主体优势,则不仅有助于增强其个人魅力及道德感召力,更有助于挖掘教育作为人性启迪与情感联结的本质意义。

其次,疏通文化认知梗阻,教师以“德”树威。消除文化认知上的障碍,是促进师生间进行平等对话与知识共创的途径,也是构建更加包容且富有人文温度的教育生态的关键。借助相互理解的互育教育模式,师生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学习,共同寻求对话、理解和认同。教师不再充当教育场域的独断决策者,而是转向为学生提供个体展示空间的赋能者,以及尊重、接纳并融合学生见解的整合者。师生双方能作为独立自主且自由发展的对话主体,共同推动价值观念的有效碰撞、信息的双向流动、思想意识的即时传递以及人生意义的分享。这一过程凸显了教师宽容、高洁、耐心的美德,散发出教育的人性光辉与爱的魅力,从而也帮助教师树立了魅力权威。这种内在生成的教师权威,实际上是去“权”保“威”添“信”的“威信”,是教师对学生的合理影响与潜移默化的结果^[34],它始终走在由教育初心使命与技术本意所设定的主体性发展轨道上,能够增强数智时代教育转型的力量与韧性,是新时代教育范式固本培元、永葆活力的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09.

- [2] 沈萍霞. 教师权威的困境与出路探索[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26.
- [3] Tornatzky L G, Fleischer M, Chakrabarti A K. 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1990:153.
- [4] 许森,王艳玲. 高中生参与在线课堂互动的状态、过程与效果[J]. 教学与管理,2023(33):42-48.
- [5] 郭顺峰,李光,邹红军. ChatGPT引发的“以人为师”合法性危机与应对——基于技术批判理论视角[J]. 电化教育研究,2023,44(11):28-35.
- [6] 刘向辉. 何以为师:教师权威的时代变迁与遭遇[J]. 当代教育论坛,2021(5):95-100.
- [7] 赵爽. 教育政策合法性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5:24.
- [8] 黄甫全,伍晓琪,丘诗盈,等. AI全科教师主讲课程学习成效试验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2021,27(1):32-43.
- [9] 闫乃睿,宋萑. 技术之痒:教师 AI 威胁感的生成与应对[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45-56.
- [10] 杨一格,黄甫全,梁梓珊. 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减负效应:一项试验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2):46-62.
- [11] 杨鑫,毛雨函. 具身认知视域下科学教师 GenAI 智能体技术依赖隐忧与主体性回归[J]. 教师教育学报,2025,12(5):32-40.
- [12] 檀传宝. 走向新师德——师德现状与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7.
- [13] 班建武. 教师媒体道德形象的影响及原因、对策分析[J]. 教师教育研究,2007,19(6):28-32.
- [14] 王金柱. 审度技术的镜象维度[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4):31-36.
- [15] 苗逢春. 基于教师权益的自主人工智能应用——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的解读[J]. 开放教育研究,2024,30(5):4-16.
- [16] 高颖,曾文革. 数智时代的高等教育:风险生成及结构化规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6):92-98.
- [17] 刘长燕,郇全民. 文化进化的模因视角及其哲学意蕴[J]. 哲学分析,2022,13(1):154-164, 199.
- [18] 韦恩远,肖菊梅. 数字化生存的全景遮蔽与教育应对——柏拉图“洞穴之喻”之省思[J]. 开放教育研究,2023,29(1):37-45.
- [19] 舒杭,顾小清.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与行动框架[J]. 现代教育技术,2022,32(11):24-33.
- [20] 余胜泉,王琦. “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2019,40(4):14-22, 29.
- [21] 刘瑀钊. 从技术依赖到平台隔离: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孤独感的形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5):110-121.
- [22] 赵磊磊,赢萍丽,付天祎. 数智化时代教师技术焦虑的现象学观照[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2):102-113.
- [23] 约翰·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 姜文闵,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51.

- [24] 赵磊磊,鲍文雨,代蕊华.“融合”抑或“疏离”:现象学视域下智能时代教师技术适应取向[J]. 中国电化教育,2024(2):39-46.
- [25] 杜岩岩,黄庆双. 何以提升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基于X省和Y省中小学教师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4):62-69.
- [26] 王兴宇. 生成式人工智能最终会取代教师吗? ——基于主体性视角的讨论[J]. 现代大学教育,2025,41(4):35-44, 113.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 (2022-12-02)[2024-10-12]. https://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 [28] 郑旭东,马云飞,岳婷燕. 欧盟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技术创新教师发展的新指南[J]. 电化教育研究,2021,42(2):121-128.
- [29] 张桂. 教师权威与学生发展:一种哲学辩护[J]. 教育发展研究,2016,36(12):73-79.
- [30] 兰国帅,肖琪,宋帆,等. 培养人工智能时代负责任和有创造力的公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报告要点与思考[J]. 开放教育研究,2024,30(5):17-26.
- [31] 孙杰. 教师权威重塑的第三条道路[J]. 江苏高教,2011(2):53-55, 92.
- [32] 王俊鹤,李志义.“异质期望”视角下数智时代大学教师教学角色的困顿与纾解[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4,42(3):63-68.
- [33] 汪时冲,方海光,张鸽,等. 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支持下的新型“双师课堂”研究——兼论“人机协同”教学设计与未来展望[J]. 远程教育杂志,2019,37(2):25-32.
- [34] 张良才,李润洲. 论教师权威的现代转型[J]. 教育研究,2003,24(11):69-74.

Disenchantment and Enchantment: The Dissolution and Remodeling of Teachers' Authority in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SHEN Pingxia, LI Linhuo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eachers' authority is the spiritual mirror of teachers' morality, wisdom and skills, which can releas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voluntary compliance and acculturation. The noble inner quality makes teachers win infinite admiration and prestige, and its influence jumps to the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at the spiritual level, which gives birth to knowledge authority,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inspiration authority. However,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transition of technical level and the fusion of learning elements impac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paradigm. Teachers' authority encounters the crisis of “disenchant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ading of knowledge authority, the decline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fall of inspiration authority. Using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senchantment” of teachers' author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finds that the dilemma comes from the weakening of teachers' knowledge discourse power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equal rights, the shaking of teachers' traditional status caused by the subversion of fiel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motional alien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used by virtu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three core point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s the entry point, and open up a new path of “enchantment” of teachers' authority with multi-point aggregation, legal co-governanc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growth; observing the embodiment of technology and reshap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authority;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and revitaliz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teacher system; cultivating the culture of mutual educ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charm and authority of teachers. In this wa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authority is realized, and the orig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eachers' role is repaired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 authority; teachers' rol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dissolution of authority; characterization of crisis

责任编辑 邱香华 李 双